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九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六五期 ——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11a）

【书刊评论】	一本值得一读的文革回忆录	伍 国
【童年旧事】	大革命和红色风暴时期的邻人们	朱大可
【往事追忆】	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选载之二）	米鹤都
【百家争鸣】	阿伦特与中国极权主义问题	陶东风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书刊评论】

一本值得一读的文革回忆录

• 伍 国 •

——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云——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

这本近六百页的著作出版于2007年，本人孤陋寡闻，今年（2014年）才读到，但读了以后，却颇感震撼，为真实的文革历史的艰难呈现，也为高树华和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们的命运。作为读者，想要发自内心地感谢程铁军教授和已故的高树华先生克服困难，通力合作，把个人记忆，历史事件，和冷静理智的分析总结留给后人。

关于在官方文革话语（我以为，这种主流话语最主要的就是老干部和高级知识份子如何受迫害）以外的个人经历，湖南的工人造反派陈益南，湖北的独立知识份子，北斗星学会创建人鲁礼安，乃至大名鼎鼎的杨小凯都留下了很有价值的回忆文字，但《内蒙文革风云》特别值得推荐的一个原因，是高树华在文革中并没有如上述几位那样被关进监狱或牛棚，而是全程参与了文革，又因为因缘际会，得以接触大量一般基层造反者没有机会了解的文革侧面，甚至在文革后期担任过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

高树华在内蒙古的地位，似乎类似聂元梓之于全国的文革，因为他是内蒙古第一张大字报的主要作者，时为内蒙古师院外语系团总支书记，其攻击对象，也是其所在的内蒙古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按全书所叙来看，高树华虽然因为这张大字报发迹，但他的确没有去刻意迫害过任何人，相反还帮助了不少人，如很多获推荐上了大学从而改变命运的知识青年，以及乌兰夫的儿子。他造反的动机主要有二：1，响应五·一六通知，2，确实怀疑学院党委书记的做法。他本人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又是学生党员，成长过程完全得益于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政策，因此，其“造反”并非对共产党的怀疑，而是以更高的“共产党”的精神：毛泽东思想及其号召，来审视和批判离自己最近的共产党领导：党委书记。多年后，高树华仍然不认为自己对党委书记纪之的挑战有什么大逆不道：“我和师生写大字报，是对当时教育制度的压抑，对当权者实施的人性摧残的合理不满，是一次必要的反抗和冲击，抒发久被压制的不同观点，呼唤一种有限度的自发行为。”（页56）不仅如此，高树华还指出，“解放后，还没有哪一次政治运动，实行过像文革这样的‘大民主’，群众可以无视顶头上司，除了毛以外，不必看任何人的眼色，自由发表见解。以往享受特供的有权有势者，纷纷受到审查，以往被踩在脚下的小人物，最为权势者看不起的芸芸众生，终于扬眉吐气了。”（页70）“文革之前，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某一个单位的支部书记就是党的化身，大家都顺从他，服从他，按他的旨意办事。”通观全书，作者绝没有美化文革，也指出了这种“扬眉吐气”是短暂的，但他也说明，这一过程确实破除了普通人对各级官僚的迷信。高树华在自己的脚注中敏感地注意到，一旦群众组织“发展壮大到威胁当局的程度，则立即宣布为非法，大肆镇压，决不手软。”（页163）

高树华的经历也证明，当时由党委派入高校的工作组，确实是压制和激怒了大量的造反派师生。他本人去北京的文革接待站上访的时候，发现“70%以上的上访者是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学生。”（页117）他专程去拜访聂元梓，被聂元梓告知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的消息。他对聂元梓的印象是：“我不了解聂元梓在文革后期的所作所为，但我当时见到的聂元梓是有气度的。”（页122）直到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十六条”的公布才解放了“被工作队逼至疯狂的人们”，他感到“无比激动……需要献身，把自己的命运与文化革命连在一起。”（页152）甚至认为，“不论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至今感谢毛领袖，是他解救了我一样的上百万青年……”（页189）我以为，在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开始离开人间的时候，后来者需读到这种真实的，回到当时历史现场，而非以后来的政治定性掩盖一切的情感，再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事实上，在封闭的政治环境下，年轻一代人反而更容易出现穿上红卫兵服装以取乐的闹剧。

在高树华看来，派性斗争起源于始于1966年8月，终于当年12月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因为这场运动从学校推向社会以后，引起了反弹，“视党组织高于一切，与党组织有各种利益的老党员，老模范，老先进”起来挑战“反对共产党”的造反派。笔者认为，今天，如果我们不再纠缠于“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政治定性及标签，那么可以说，两者的冲突完美地象征和注释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之间的内在矛盾。在“毛”和“党”之间，毛已经不仅仅是“党”形式上的最高领导（当然他也绝对不满足于此），而是他本人：一个高于党和国家机器的人间救主，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偶像。“造反派”就是那些听从“毛泽东”召唤的狂热份子，而保守派则是继续维持对党/国机器和秩序，及其代理人的忠诚的一部分人。他们之间的冲突，就是毛泽东和党的冲突的外在化，而他们实质上的统一和现实中联合的必要，也正因为毛泽东和党终究是分不开的。正由于保守派对秩序的维护，他们获得军队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高树华也说明，军队支持保守派，“乃是轻车熟路，顺理成章的事情”（页209）。

关于军队在文革中的态度，高树华的回忆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他指出，军队在地方镇压造反派，“其根源在军方上层”（页209），也就是在“二月逆流”中大闹怀仁堂的老师。在高树华去北京参加会谈期间，蒯大富向高透露，内蒙古军区枪击造反派事件有老师支持，而高本人则在后来参加九大时亲眼看到简报，内蒙古军区在支左问题上强硬回击，有两位老师的

签字（页252）。“二月逆流”在过去的研究中，一直被认为是上层斗争，其对基层的冲击，似乎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而“三支两军”，则完全被看做毛泽东和林彪合作的杰作，其他老帅似乎都是受害者或旁观者，但这些都不容易解释为何军队偏偏支持保守派，而且可以在各地强硬反击造反派这一事实。高树华的回忆，对进一步研究老师对地方军区 and 驻军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于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关系，高树华进一步指出，造反派对保守派的打击，是个别人的非法行为，而保守派对造反派的打击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官方行为。从数量上看，挨整的造反派人数远远高于遭到报复的保守派。从后果看，对造反派的整肃要进入档案，最终造成受害者前途的灾难。尽管高树华由于自身造反派的身份认同，可能对这一性质的群体和个体给予了更多的同情，但他在这里的分析却提醒我们，即便在毛泽东号召造反的短暂时期，保守派仍然是占有政治优势的强势群体，而造反派，和历史上一切反体制的人一样，始终是处于实质上的弱势地位，尽管在道义上似乎他们暂时占有优势，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背书，更不必说在更长时段中，造反派所受到的排斥。在266页的脚注中，高树华和程铁军洞察到，保守派其实是遵循着共产党长期形成的权威文化政治伦理，同时培养奴性和投机心理，而造反派则以挑战和不服从为荣。他们认为，这种看似相反的特征，恰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矛盾人格的一种复制。”事实上，西方的一些文革研究学者也已经指出了在毛泽东身上兼具革命者和权威统治者的两重性。笔者仍然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有所重叠而非同一的概念。共产党固然是一个革命政党，但在建国以后，却日益制度化，官僚化，权威化。刘少奇，陈云，周恩来以及绝大多数的官僚都代表了这种倾向，而作为思想者的毛泽东则十分担心和警惕这种倾向，这种真实的担忧是不能以权术来解释的。也正因此，毛泽东在党内从精神和意识层面来看孤独的，他所号召起来的造反派同样是一些事实上的弱者。当然，毛泽东本人作为统治者也有权威和制度化的一面，而且最终回归了权威和制度。

关于文革中的群众专政，高树华和王友琴和其他文革研究者一样，指出“群众专政”是文革中最恐怖和为人痛恨的事情，但他所提供的事实则证明所谓群众专政不过是革委会的一个工具，成立于1968年1月15日的呼和浩特市“群众专政指挥部”接受自治区和市革委的双重领导（区革委成立于1967年11月1日），有“坚实的权力支柱”（页292，300），而像他本人这样的真正出身群众的区革委常委，却根本不知道“群众专政指挥部”的组织和运作。这里表明，在革委会成立后的“群众专政”，已经不是过去的“造反”，而是以群众的名义实行镇压，用福柯的话来说，不过是把国家机器的权力外包（outsource）出去。不仅如此，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不再允许任何不利于自己的“四大”存在，几个过去的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成员接受“群众专政。（页320）”就革命委员会的内部运作来说，虽然指出真正有决策权的是军代表和老干部，而非像他这样的“群众代表”，但高树华也客观地承认它有一定的民主性：“一个普通学生或者工人代表，敢于在常委会上同党政军高级领导当面顶撞……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页327）。

高树华对于参加九大的回忆也对当时一些重要人物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在他的笔下，朱德虽然受到排斥，但十分宽厚慈祥，还夸赞邓小平能干；邓小平写了认错的书，不仅保证永不翻案，还提出愿意做一名图书管理员。他还亲眼看见了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陈毅，李先念等人为“二月逆流”写的检查（页382）。过去一直受到官方史学渲染的影响，认为老帅们铁骨铮铮，誓死抗争，受到迫害，但读到此才发现他们最终还是迫于压力检讨，以换取继续生存，但考虑到有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教训在前，写检查以输诚过关，不论是主动还是被迫，都是不难理解的。书中还写出了陈永贵的朴实，胡耀邦的忠诚坦荡，李雪峰的风趣睿智，赵紫阳的实干和理性，对江青则是全盘否定。他对赵紫阳的评价是：“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师长，是党内最实际，最聪明的经济学家。（页426）”高树华在写作此书时，已经读到过并也引用了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但是他从个人经历出发，通过与周恩来的几次接触，

如实地写下了周恩来的细心和蔼，对他的关心爱护，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我觉得总理真心实意要把国家搞好（页400）”，但他也指出了周恩来内心的复杂和处境的艰难，如周在1975年1月25日（江青在前一日转达中央批林批孔文件）亲口告诉他，“关于批林批孔大会问题，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在高树华问到“怀仁堂事件”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令高树华感到周恩来“确有难言之隐。”笔者以为，高树华作为一个完全脱离体制的独立写作者，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其实没有任何必要和义务美化周恩来，但是他的描述可以有助于平衡今天越来越甚嚣尘上的吹捧林彪，贬低周恩来的倾向。过去对周恩来的神化固然有过火的成分，但这并不等于一定要把周恩来贬成伪君子和大恶人才恢复历史的真实。对周恩来有研究，有批评，也有同情的理解，可能是更客观和正确的态度。

高树华和乌兰夫的儿子力沙克曾是同事，还曾经帮助力沙克逃跑，也熟悉乌兰夫的其他子女，文革初还被作为乌兰夫黑帮人物被批判，但当他本人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作为造反派被隔离，他的妻子趁去北京的机会打电话给力沙克，对方却表现得十分勉强。在高树华被关押审查的五年间，乌兰夫一家都没有伸出过援手。后来，经商成功的高树华在北京内蒙大厦中巧遇乌兰夫的大儿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受到布赫的热情邀请，却当天就退房离开了宾馆，绝不再联络。这里，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小人物的自尊心跃然纸上。

高树华懂俄文，英文，在从事商贸过程中到过蒙古，俄罗斯，乌克兰，这使得他在文革后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思考，又多了一层经过对细节的观察和中外对比后拓展达到的深度。他注意到：苏联解体后，为了糊口而打工的前苏联高级将领也表现得“极有教养”，“十分坦荡”，“俄罗斯人在贫穷，物资极度匮乏的境遇中，仍保持着文明，礼貌和高教养的气质，表现得奇异的冷静。（页557）”他本人除了难以避免的自辩，也对伤害过的人作出了道歉。

笔者以为，对文革的研究假如纯就事实重构来说，必然需要尽可能多的官方文件，而口述史和个人回忆都难免带有主观和记忆不准确的缺陷。然而，就从底层视角了解文革的意义和诸多面向，而非仅仅核对和考证史实而言，则个人回忆是弥足珍贵的材料。一些小人物或中层人物的回忆，有独特的经历，有分析，有反思，有脱离官方话语的独立思考，更有经历了人生起伏迭宕，百转千回以后的精神沉淀和情感累积，对后世了解文革来说，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另外，文革研究必将越来越采用以底层和边缘的视角来观照的路径，而不仅仅限于上层斗争，意识形态，和政策运作。

至于本书由刘国凯先生所做的序言中强调的“两个文革”理论，笔者则以为，“两个文革”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有一定的启迪意义，但高树华和程铁军合作的这本回忆却遗憾地并不足以作为“两个文革”理论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高树华以第一张大字报对师院党委书记发出的最初挑战既不是基于任何理论或政策的分歧，也没有特殊的诉求（假定说书记要搞革命而高树华想涨工资，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追求），更不是因为他受到院党委书记的长期欺压，而仅仅是对书记压制了小人物参加文革的要求感到不满而已。换句话说，他想绕过书记去革命，但并没有背离“革命”的这一单独的目标。他的造反源于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毛倡导的造反精神的响应，他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基层党的领导，而这些都是毛泽东想要的。后来他又因为造反的功绩经过“三结合”成为革委会常委，九大代表，直到在文革结束前夕当上呼市市委书记，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真正发起和参与任何在毛泽东设定的议程之外的活动。“两个文革”理论的意义在于从认识论角度提醒人们不能把文革看成一个整体，而要注意其多面性和上下层之间的分隔，但这种以“上层”和“基层”来划分的方式在一个极权社会里似乎并不完全有效。

或许，我们对文革可以按照前述的方法，区分“治”（orderly）的文革和“乱”（disorderly）的文革。如前所述，“治”——即党委，革委会，军管所代表的权威主义，官僚化，制度化，与“乱”——即红卫兵和造反派所代表的造反精神，无政府主义倾向之间的反复缠斗和较量，是

文革中一条很重要的主线。这种对抗，既有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中作为革命者和统治者的矛盾的投射（如毛既鼓励造反又鼓励建立革命委员会，反对工作组却又搞军管，反复赞扬巴黎公社却最终否定上海公社），有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革命”和“建设”的紧张，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威与秩序和反权威力量较量的影子。那种认为文革其实只有1966—1969三年，止于九大的论点，其实是在无形中认定“乱”的文革才是正宗文革，一旦革委会全面建立，学生下乡，党组织恢复活动，九大结束，“文革”就结束了，然而，这却很难解释革委会治下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严酷程度远超过红卫兵这一事实，也忽略了正式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由党委所主导的迫害。可以说，文革还是十年，只是在九大以后，恢复到了外表以“治”为主，并试图遏制“乱”的阶段，然而在治的外表下，这个阶段的残忍并不逊于上一个阶段。

~~~~~

## 【童年旧事】

### 大革命和红色风暴时期的邻人们

• 朱大可 •

“上海太原路二十五弄十号”，是我生命中最奇妙的一环。在那个地点，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

我家的房子位于上海西区旧法租界的中心，是一个西班牙式花园住宅的小区（后来被称作“太原小区”）。攀附着爬山虎藤蔓的墙垣、狭小的窗户、拱形的门楣和光线黯淡的走廊，混杂着法国梧桐、夹竹桃、无花果树的后花园，这些部件投影在一个孩童的记忆深处，焕发着一种经久不息的阴郁的美。

在幼儿园时代，我最美好的记忆是生病的日子。保姆带我去附近的地段医院看病，踩着近午的柔软阳光，走过那些为美丽的花园而修筑的篱笆。常春藤和牵牛花在微风中摇晃，弄堂和马路上几乎寂然无人，宁馨得仿佛睡去了一般。春天散发出爱的芳香，令我融解在这白昼的温甜之中。但这幸福的岁月过于短暂，我还未来得及消受，它就已匆匆流逝。

由于房租高昂，四周的邻居除了少数平民，大都是大资本家、高级医生、大学教授、电影导演、少数共产党高级干部和外国侨民、以及一些奇怪的前朝名流的遗少，如陈独秀的女儿陈红一家、民国第一任总统黎元洪的长子等等。只有我爸我妈是普通的中学教师。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已经念小学二年级了。我们那住满了“牛鬼蛇神”的街区，是大革命和红色风暴打击的重点。而我的一年级班主任陶，便成了我所面对的大革命的第一个祭品。

陶是个面容凶恶的老处女，兼教我们启蒙语文：识字、拼写和说话。尽管语文成绩全班第一，但由于喜欢上课时“做小动作”，我还是成了一个“坏孩子”。除了罚站之外，每一次家长会，她都要控诉我屁股上长着钉子，让我白白挨了老爸老妈的无数“教训”。后来我心生一计，家长会刚刚举行，我就从学生的行列中飞奔而出，跑到母亲跟前狂吻她的脸颊，进行超前感情投资，以免等一会老师告刁状后回家挨揍。这一举动引得在场的家长们哄堂大笑，弄得母亲满脸绯红，很不好意思。但这计谋还是奏效了。那天，班主任竟出乎意料地没有说我的坏话，看我的眼神甚至还有了一丝罕见的笑意。令我有了跟她亲近的冲动。

但我终究没敢去亲吻女教师的脸。1967年红卫兵运动爆发后，她因性情古怪而理所当然地成为高年级学生的批判对象。第一次批斗大会之后，她就在我当时上课的教室悬梁自尽了。那教室是一幢单独的灰色小楼。她乘着夜深人静，用绳索系在楼梯顶端的木栏上，怒气冲天地

把自己弄成了一具死尸。一个亲眼看过现场的同学告诉我，她的吐着舌头的死状，比生前更加狰狞可怖。那幢小楼以后被贴上封条，空关了数年。在深夜，巡夜人有时可以看到微弱闪烁的火光，但没有人胆敢上去探索，据传那是她的鬼魂在楼上徘徊。

班主任的自杀是一个微妙的信号。西方国家已经开始紧急撤侨，住在我家对面的几户犹太人和白俄似乎一夜间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大批红卫兵开始在我们街区出入，展开了无休无止的抄家运动。我们全家都恐惧地等待着厄运的降临。那天晚上十点左右，楼下突然传来粗暴的敲门声，母亲赶紧关了灯，从窗帘后向楼下偷看，整条弄堂站满了黑压压一片的造反队，手持木棍，秩序井然，犹如经过严密训练的士兵。整幢房子都在恐惧中沉默着，没有人胆敢前去开门，也不知道今天该轮到谁家倒霉。最后他们敲开了大门，把底楼的那家印尼归侨的家抄了个底朝天。而我们与剩下的另外两户人家则暗自庆幸：今天又侥幸躲过了一劫！

这样的情景后来越来越像家常便饭。红色恐怖已经席卷整个中国。人人都深切感到了朝不保夕的危机。一些人被造反者从家里赶走，而另一些人则在悄然死去。每天早晨，我透过狭小的窗户都能看到，殡仪馆的丑陋的灰色运尸车无声地驶入，停栖在某个我所熟悉的门牌号码面前。从房子里抬出了自杀者的尸体。其中一些死尸已经变形。越过白色的尸布，可以看见死人神秘隆起的肚子。这是一种恶毒而迷人的景象。有人在静静地围观。令人作呕的死亡的恶臭，象瘟疫般在四周弥漫。

有时我也会兴高采烈地去“参观”一些在弄堂里举行的即兴批判会。楼下的那家印尼归侨，三个姐妹长得如花似玉，远近闻名，号称“姚家三姐妹”。她们的批斗会最是轰动，吸引了大量“观众”，整条弄堂挤得水泄不通。附近中学的红卫兵们剪掉了她们的包屁股小裤腿的裤子和烫卷的头发，稀疏的残发间露出了白嫩的头皮。她们的父亲遭人痛殴，衣物、高跟鞋和法国香水则被堆在弄堂中间放火焚烧。人们在高喊口号和起哄，像出席一场小型的狂欢庆典。突然一声爆炸，人们吓得四处逃窜，后来才发现不是炸弹，而是某罐化妆品在作祟。那些在灰烬中残剩的衣物，在黑夜降临后被居民偷走藏起，改做成了孩子的内衫。好布料，多好的布料！一个老太太在灰烬里搜寻，手中执着一些碎片，摇着头自言自语。夜风吹散了最后那些黑色的灰烬。

这些革命戏剧几乎每天都在四周上演。金条、珠宝、瓷器、唱片、书籍、衣物等各种细软和精美的欧式家具，成堆地从屋子里搬出，经过一场即兴批判之后，被卡车运走，变得不知去向。一次，红卫兵从对面的资本家的沙发垫子下面里找出了上百只旧尼龙丝袜，原来那家女主人有一个癖好，穿过的袜子从来不洗，往沙发下一塞了事。这些臭袜子便成了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生动教材，在批斗会上向四邻展示。

我记得的另一场批斗会的主角是隔壁十二号的作家秦瘦鸥夫妻。他们俩均长得又瘦又高，走在一起，宛如两根形影相吊的树枝。红卫兵把他们押出房子，令其站在台阶上，脖子上挂着临时制作的牌子，上面用墨汁书写着“反动文人秦瘦鸥”字样。他的罪名并非是因为写作那些诸如《秋海棠》之类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而是把印有毛泽东照片的报纸做了书皮。那群佩带红色袖章的学生在手舞足蹈地叫喊，四周站着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过于年幼的人民群众。

母亲工作的上海第二女子中学就在马路对面，高干子弟居多。当时的中共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女儿都在那里念书，其间诞生了一批极为凶悍、打人不眨眼的母老虎，在当时的造反界名声显赫。红卫兵只要一抬脚，便可以把我们家搞得天翻地覆。奇怪的是最后居然幸免于难。由于有教师检举揭发，一群表情严肃的小女生曾经来家里考察了一番，发现除了一家老式的德国钢琴（我母亲曾经是音乐教师），就剩一些不起眼的旧家具，沙发的罩布上还打着补丁（在当时，补丁是无产者“艰苦朴素”的道德标记）。她们为此下的结论是：我母亲“不是资产阶级”！我们家就这样侥幸逃过了一劫。尽管后来父亲被关押审查，但有

限的家产终究没有遭到洗劫。我尤其感激上苍，留下了这架钢琴，它后来成为伴我度过漫长的少年时代的密友。

陈独秀的孙子比我大两岁，长相有些古怪，头颅的比例明显小于身子，因此得了一个“小头”的诨号。我们有时在一起玩耍，但我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性情诡诈，手脚又不干净。一天，我向他出示一本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结果那书转眼间就不翼而飞。父亲说，一定是他偷的，遂教了我一个妙法。我立即就去“小头”家对他说，我还有另一本好书，但须用那本童话交换。“小头”眼睛一亮，从毛线衫里戏法似地掏出了失踪的书——他居然还没来得及“销赃”！从此他被列入我们家不受欢迎者的名单。

陈独秀的这个女儿，可能是他晚年红杏出墙的结晶。她也是个中学教师，丈夫因现行反革命罪而遭到枪决，独自领养着儿子，顶着父亲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的政治恶名，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她这时已经得了肝癌，眼见她日渐消瘦下去。她从我家门前走过，穿着灰色女式中山装，脸色发黄，表情呆滞，从不与我们这些孩子打招呼，犹如一个孑然而行的女鬼。由于对不肖儿子的绝望，她几乎卖光了家里所有的家具，在外面吃着馆子，享受生命的最后大餐。在她死后，“小头”一无所有，被送到新疆与表姐一起生活，从此下落不明。

我的同学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沈克非的孙女。她生下时是个阴阳人，需要动手术切除其中的一部分器官。祖父爱女心切，切除了其男性器官，希望把她变成一个女儿身，结果铸成大错。小学一年级时，她坐在我隔壁，虽然留着小女孩的短发和刘海，却喉结突出，发出成人男子的嗓音，而且皮肤黝黑，面目丑陋。这显然是对她祖父杰出的外科技术的严重嘲弄。不仅如此，她的智力只有三岁，成绩一塌糊涂。每逢下课，她就面对墙壁站着，仿佛一尊雕像。文革爆发后，她就不再来上学了。但时常还能在他们家的豪宅前看见她。她把带有湖石假山的前院的大门开个小缝，向四处偷偷观望，见有人走来，便赶紧害羞地躲到门后。后来这幢豪宅遭到查封，她们全家被赶进了汽车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倩影。

1967年红色风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许多邻居一夜间从空气中消失了，那些表情傲慢的小男孩和花枝招展的小女孩，也都相继神秘蒸发。整个街区变得空空荡荡。大量的房屋被空置起来，成为我们这些“幸存者”玩耍的天堂。一到晚上，我们就打碎玻璃，从窗口爬进那些黑暗的屋子，在光滑的柳桉木打蜡地板上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有一个夜晚，我偷了家里的手电筒，和几个小朋友一起钻进了对面的空屋。在里面上下狂奔，乐不可支，突然看见一个朦胧的白色脸庞正在从玻璃窗外向里面凝视。我恐怖得大叫起来。所有的孩子都跟着失声尖叫。那张脸随后就消失在月光里。从此，我们没敢再涉足那个“闹鬼”的房子。

到了1968年间，由于死人太多，各种鬼魂的传说一度在我们的弄堂里甚嚣尘上。我们大家对此都深信不疑。当酷热的夏夜降临时，我们都在外面乘凉，到午夜十二点，四周时常会出现一些神秘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乌鸦的叫声。但上海市中心根本没有乌鸦，而且那声音来自地面而非空中。它尖利地叫着，飞速地从弄堂的一端一经过乘凉者的脚边，掠向遥远的另一端，又从另一端急速折回。所有的乘凉者都感到毛骨悚然。低头寻查，竟没有任何发现。人们最后纷纷躲回家里，掩上了房门。闷热的弄堂恢复了死寂。只有昏黄的路灯在暗夜里对愁而眠。

在我们对面的一排楼房的尽头，靠近太原路的一头的楼房，曾经被我们当作玩军事游戏的秘密堡垒。但其中一间屋子的我们一直未敢“占领”，因为据说那里曾经自杀过一对乱伦的父女。革命爆发的时候，女孩的兄弟们率先起来检举揭发资本家父亲的这一滔天罪行，家族的丑闻立即转变成了公开的政治罪恶。父女俩内外交困，双双开煤气自杀。人们打开房门时他们已经断气，但却保持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姿势：女儿端坐在沙发椅上，安静得仿佛入睡了一般，而父亲则跪在她的面前，凝结在一个忏悔者的姿态上。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人们道听途说和添油加酱的结果。那扇被十字封条封住的房门，黄铜的圆形把手开始发出绿锈，深棕色的油漆也已经部分剥落，从门缝里吹出了一种淡淡的神秘气息，仿佛是陈旧地毯的霉味。我很想进去瞧瞧，但终究没敢撕掉那个盖着某某司令部图章的封条。到了文革后期，那楼住入了一个单身老太太，雇有一个保姆，深居简出，很少与外界接触，这就是后来在美国写成畅销书《生死在上海》的郑念。

在郑念南面的一幢小楼里，住着满脸麻子的著名英国文学翻译家方平。他每天上下班都从我家门口走过，走路的姿势有些古怪。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希望换一个环境。我为此曾经去看过方平的房子，他夫妻俩也来看我家的房子。我和母亲都很喜欢他家后花园里的那片修剪整齐的草地，四周盛开着丁香和桃花。尽管最后没有达成换房的协议，但我却和方平从此有了短暂的接触。那时，我是个普通的技校学生。

周恩来逝世后不久，方平从西方朋友手中得到了那幅法国记者所摄的著名的周恩来照片，如获至宝，与我一起研究它的构图和用光。周恩来病入膏肓地坐在沙发上，浑身散发着伟大而孤独的人性光辉。那只白玉色的茶杯放在他的手边，里面盛放着他最后的渴望。我和方平都被这满含眼泪的图景所深深地震撼。在1976年，周恩来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道德偶像。他的死亡以及稍后的毛泽东的去世，终止了历时十年的意识形态革命。1977年，我家搬到了陕西南路绍兴路口的另一所住宅，与方平的交往猝然中断。那次搬家的另一更严重的后果是，我切断了与童年的联系。

越过文革岁月的苦难和欢乐，我长成了一个神色忧郁的青年。

□ 摘自《作家》

~~~~~

【往事追忆】

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选载之二）

• 米鹤都编撰 •

◇ 西纠及其通令

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其实是和我们这一大批人对红卫兵的基本看法有很大关系，有个一脉相承的思想基础。偶然性从西纠成立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十分明显。我们学校高二的王向荣，他当时并不是学校领导集体里的成员。不过，他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很多学校想要一起搞一个红卫兵的联络站，后来大家议论议论就议论成了搞红卫兵纠察队。他回来就和我们说纠察队的事儿。我说：我在学校还有很多事，咱们自己还忙不过来呢，你就去应付吧。他说：我应付不了，孔丹，只有你去，别人谁也管不了这个事儿。咱们学校有这个能力，应当由咱们来做。

西纠怎么成立的？陈小鲁回忆是他在一个场合下说要搞一个组织。（11）我则是从王向荣那里知道的。这都无关紧要，主要是大家一拍即合。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了，谁是司令什么的。不过我们有几个编号、排名什么的，我是1号，也不过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可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负责人，现在叫一把手，或者说就是四中出的组织者。西纠领导层的这个结构，不仅和四中地位有关，和陈小鲁、董良

翻的性格也有关系。我则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学生干部的历练，不是一天两天的历练。所以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在西纠总部里，有几个组。其他人回忆说，西纠有宣传部什么的，这似乎不对，应当叫宣传组吧。有一个组织组，组织组是王向荣负责。还有一个后勤组，由赵胜利掌管。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动笔，特别是很重要的6号、7号两个通令是李三友为主起草的。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当时实际上已经被打成北京市委的“黑帮分子”了。不过在我们的眼里，李三友还是自己人，所以让他发挥着幕后的作用。其实马凯也在里面帮着做了不少工作。我印象中，起草西纠的通令马凯也参与讨论了。

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文连是徐海东的儿子，那时是指导员。师大女附中那个连谁是头儿，我记不太清了，包括邓榕当时都参加了女附中连。所谓一个连，不过就是几十个人。纠察连的任务就是住在总部，应付紧急情况以便集中行动。我们真正有组织的行动也就有几次，如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等。总理要求西纠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西纠又临时从西城区各个学校抽调了300多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不是从纠察连直接派去的，但也是以西纠的名义组织的。还有些是临时情况变化就临时调动，比如保护班禅大师等。

西纠成立时，我觉得社会上太乱了。一方面是老干部被冲击，这是一个矛盾。学生和红卫兵起来冲击的第一批人是谁呢？是校长和校党支部书记，其实很多中学、特别是北京重点中学的书记、校长，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如四中校长杨滨就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是宋养初部长的爱人。所以这场运动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有一些干部子弟突然就悟到这个事儿了。这是冲谁来的啊？我们会有一个内在的本能反应。另一方面是当时的血统论和横冲乱砸的暴力行为，传统教育让我们觉得不能接受这种现状。比如说我当时作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长期被灌输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团结所有同学，凡事要讲政策。我们的父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从来没有这种观念。他们自己的出身和生涯也说明恰恰相反，人走什么道路，主要在于后天受到的影响和自身的选择。

我觉得，如果要讲西纠的产生，就是这么一个大背景，其实质是对整个文化革命的一个反动。社会上正好有我们这样一批人，就自然成为西纠的基础和骨干。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冲击时就要站出来保护；另外，我们有组织观念，要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机密；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无法接受对群众、甚至成分不好或有问题的人采取暴力的做法，这些就是我们组织西纠时的基本观念。但是，我们的这种立场并不为人接受，西纠这个变种实际到后来是没有生命力的。在现实中，最后是谁都不容，哪方面都不容。中央文革不说了，连激进分子们也不容。就是在我们学校里，很多低年级的红卫兵也很不满意。他们说：孔丹，说好听点那叫策略派，说不好听的就是保守派，他们就不是真正的红卫兵！所以，当时成立西纠就是这么一个特殊大背景下的一群人，自然而然地起来了，发挥了一点作用，而且压制和抵制了他们看不惯的东西和做法。

当时红卫兵们在社会上四处出击。我记得有件事是一些红卫兵到新华书店，不准他们卖毛主席的著作。他们说，毛主席的著作是红宝书不能卖，卖就是对伟大领袖的亵渎。新华书店对此也有点心惊胆战，那也不能白送啊。于是他们找到西纠，要求给个说法。当时大家一商量，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非常重要，同时这书属于国家的商品，不让卖不合适。于是由西纠签字，同意新华书店继续出售，后来的通令中对此也做了进一步的规定。

还有件事，当时有义利食品厂的人来西纠，说有红卫兵组织勒令他们：说义利的包装纸上

有一对和平鸽，是修正主义的图案，不能再使用了。义利食品厂当时是北京最主要的食品厂，如果不能正常生产，将会对北京的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工厂很着急，说十一很快要到了，换新包装已经来不及，如果不用老包装实在完不成供应国庆节市场的任务，也请我们给个主意，当然，他们实际上是想继续使用老的包装纸，但有不敢惹那些红卫兵们。我就派赵胜利等人去看了一下。他们看后认为没有多大问题，就由赵胜利签字表示西纠同意继续使用旧包装，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西纠当时最主要的，是通过通令来发挥作用。西纠影响最大的就是十个通令。我们开始出了1号、2号、3号通令，是零敲碎打。4号通令我觉得应该有一点价值，是专门制止打人的。我们把毛主席语录放在最前面：“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4号通令主要提出了七项规定。5号通令是关于抄家要注意的政策。

之后，我记得是三友对我说：我们不要再这么零零碎碎地弄，得针对整个社会出现的、我们认为应该要制止和纠正的现象，在下一个通令里系统地讲一下，做一个政策性的指向。比如说把所谓的地富反坏都赶回原籍这件事怎么说？比如说红卫兵串联怎么弄？还有到处打、砸、抢、抄啊，怎么处理？政策性怎么把握？等等。另一方面，前面的几个通令我拿回家都给我母亲看了。她也觉得不够系统，比较零散，她只是有这么个感觉。但我心里把这视为是对我的指导。上面这两方面的因素，就成为了西纠最重要的6号、7号通令的由来。

6号、7号通令的主要起草人是李三友，他起草后我和秦晓修改。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字斟句酌。这是对当时日趋严重的局势相对比较完整的政策性意见，把各方面措施、反对意见都说到了。今天看，通令有点像中央文件的范式。我们也确实是希望以中央文件为模版，所以在口气上也有些居高临下。这可能源于我们这批学生党员，认为自己对党的传统、党的政策和《十六条》认识理解上的正确性；也可能源于长期的学生干部经历使我们多少带有对低年级同学说话的那种口气。但是我们讨论的时候也特别意识到，通令在表达上不能和红卫兵抵触得太厉害。我们没有说“不要如何如何”的否定性语式，而使用“都不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这种措辞。比如：我们说“打人，逼供信……都不是文斗，都不是我们应采取的方法”；关于体罚，我们也说：“跪、趴、弯腰、负重、游街、长时间站立、长时间举手、长时间低头、长时间做重活都属于体罚，及变相体罚，这都不是我们应采取的斗争方法。”关于侮辱人，“带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头等等，都属于侮辱人，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如此等等。

当时，几乎所有反馈回来的消息，就是看了这个通令的人，不论哪个方面的，从外省市党委、政府，到社会上的各个派别组织，甚至包括后期审查我们的人，都认为这两个通令是有背景的。其实，那时候上面已经是两条线了。一条是中央文革在不断地接见人、发动红卫兵；另一条是总理在力图控制局面、稳定整个社会秩序。当时社会普遍认为，6号、7号通令的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出主意。中央文革认为我们的后台就是周恩来，一开始他们就视周恩来为文革运动的障碍，是刘少奇之后党内与他们对立力量的领袖。其实无论是我的意识中，还是我周围的同志们的意识中，我们也确实自认为我们背后是周恩来，或者说我们是周恩来通过国务院系统加以支持、借重甚至加以指挥调动的一个力量。

西纠的所有通令，我确实回家都曾拿给我母亲看过。不过都是我们已经完成了、公布了通令。这些通令大都得到了她的肯定，但基本都是一种事后的反应。对于6号、7号两个通令，她的意见是：这个通令水平还是可以的。写得很清楚，有政策水平，文笔也不错。因为她长期跟着总理做文案工作，对文笔方面很注重。我还告诉她说：这是李三友写的。不过，我今天仍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她从来没有说过：唉，你们现在应当写一个什么通令，以后再写一个什么通令。她甚至都没有提醒过我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关注些什么热点。另外，她也从没有对我明确说过，这些通令她要不要向总理报告。只是在我印象里，西纠的通令她确实是肯定的。但

我从来没有从她那里，或者通过她从总理那里得到任何指令或指令性的暗示。

这点也可以从西纠的10个通令的不连贯性来印证。比如说很多内容重复，比如说政策不连贯，比如说得不很系统。特别是8号通令在6号、7号通令之后，实际上又反过来了，讲什么砸了就砸了，抄了就抄了的。那就是因为6号、7号通令遭到相当多的红卫兵的攻击，让我们不得不向后退。这些通令反映的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些思想认识，并自发地试图引导红卫兵运动的方向，绝对没有任何人在指使，这是肯定无疑的。

◇ 西纠的活动

西纠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到8月31号就派了个大用场。跟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干警一起，接受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广场的保卫任务。那天，我开始是在下边安排和指挥西纠的纠察连配合卫戍区的部队保护毛主席。后来接到通知，说要西纠派几个人上天安门，就把我叫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了。我上了天安门没多久，毛主席坐的北京212吉普车和总理、谢富治坐的吉普车就被红卫兵们围住了，困在了金水桥前面。红卫兵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没人敢碰，部队也不敢碰。这样，整个场面就失控了。谢富治负责安全，他紧张得不行，赶紧跳下车来维持秩序，可是不起作用。红卫兵们当时对谢富治、傅崇碧等负责警卫工作的领导，根本不放在眼里，没人理会他们。后来没办法，就叫西纠过来帮忙维持秩序。西纠的纠察队员把皮带一解，不管不顾，挥舞着皮带，连抽带打地打出了一条路，让毛主席等人的车从金水桥开了过去。这是当时真实的情况，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得清清楚楚。在当时西纠人的心目中，毛主席是我们红卫兵的红司令，不能有任何危险。

第二天，也就是9月1号，谢富治就到西纠最早在九三学社的总部看望我们。我记得在一个院子里，他刚一进来就非常兴奋地说：西纠可是做了好事。他把裤腿拉起来说：你看，我的腿都是青的。要不是你们西纠的队员扶着我，我踩都被踩死了，我这个命还是你们西纠救的。你们保卫了毛主席。这次要是没有你们，万一主席出点儿问题我怎么交待！可是，日后迫害西纠、联动时，谢富治可是没有手下留情。

8月31日那天，我上天安门以后，就准备好了一些西纠的袖章，准备献给领导同志佩戴。那时我们的袖章与一般红卫兵袖章相比，显得特别大。我给江青献了一个，江青应该知道我。因为我简单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孔丹，孔原和许明的儿子。她就说：噢，噢。就这么一句，没有太多的反应。而且我看得特别清楚，江青戴上之后，“啪”地就用大氅把袖章盖上了。那一瞬间我的反应还是有的，但没有太多往坏处去想，就是感到她对西纠可能有看法。其实，这时党内矛盾已经很尖锐了。

之后，毛主席回到天安门上。我上去又给周总理把西纠袖章带上了。我还想过去给毛主席献袖章，总理过来拦住了我，说：你这个袖章可以给其他领导同志戴，但不要给毛主席戴。毛主席是全国红卫兵的领袖，只戴你们西城纠察队的袖章不太合适。这样，我就又走到林彪面前，给他佩戴西纠袖章，他接受了，但显出沉默寡言的样子。然后，我就给叶帅戴上了西纠袖章，又给几个老师都戴了。叶帅问我：你们现在在做些什么呢？我说：我们组织了红卫兵的纠察队，现在就是发些通令，并在一些地方维持秩序，比如北京火车站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很多很乱，我们按总理指示要求已经派人去了。叶帅听后说：你们做的是非常好的事情，需要我帮助吗？我就说：我们现在缺一些交通工具，还有我们晚上要值班，可能需要一些被褥等。叶帅说：那没问题，我来负责解决。

后来西纠制作了证件，第一页是毛主席像，第二页就是戴着西纠袖章的林彪。这样的证件拿出去还是很被认可的。林彪的袖章编号是00001，本来是想给毛主席的。我后来戴的是

1 0 0 0 1，证件号也是1 0 0 0 1。这是不是就是人们所说的司令？其实没有正式的说法，就是一个主要负责人吧。

当天晚上，我回家就跟母亲说：我今天见到叶帅，谈到西纠的事了。我介绍了西纠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叶帅还要给我们提供一些支持。我母亲说：唉，这样的事情怎么能麻烦军队、麻烦剑英同志管呢，我们来解决就是了。这些事由国务院、国管局处理。你们需要些什么？我说，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不太够，是在九三学社临时的一个地方，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当总部；需要一些车辆、被褥等等。她说：好，这些我来安排。你指定一个人，我让李梦夫和他联系。随后，她就指派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李梦夫，我把这些事交给西纠负责后勤的赵胜利。李梦夫后来把西纠安排到原空军的育翔小学旧址（当时已是教育局的仓库），给我们配了车辆、被褥以及经费等。

有人回忆，那次叶帅在天安门上对我提到了刘诗昆被打的事。刘诗昆那时是叶帅的女婿，是叶向真的丈夫。我的印象不是叶帅在天安门上直接和我说的，是叶帅的儿子叶选宁找我说的。叶选宁通过徐文连找到我，说有件事要和我谈谈。我就去了北长街的叶帅家，刘诗昆也在那里，手上还打了绷带。叶选宁说：孔丹，你得帮个忙。他们要伤害刘诗昆，他的手都被红卫兵打坏了，那将来还怎么弹钢琴啊？我脑子里想，应当保护刘诗昆，他是个艺术家。我说：选宁大哥，没问题。我记得后来是派徐文连带队去的音乐学院，保护了刘诗昆免于进一步被迫害。也有可能那次叶帅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因为这事儿跟叶帅有这么个关系。具体我记不太清了，我印象深刻的，主要是叶帅对西纠的支持。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那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他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包括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外号武大麻子，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他那次把我、陈小鲁、董良翻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我小的时候，因为父母的关系和总理很熟，从没见过总理发脾气。那天，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是副部长，也算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站在那里，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总理后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都不行，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所以他当场就决定让西纠把整个北京火车站接管了，让我们会后马上布置去做安排。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翻、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翻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呆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口，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车站的事我只去看了一两次，看到大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着实感慨得很。董良翻、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

我记得那次开会出来就碰上“二李”，一个是李富春，一个是李先念，两位副总理，而且李富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改组后的中央常委。他们说：你们那个西纠很好，我们支持你们。你们那个通令也很好，就是要保护好老干部，保护好国家机密。我母亲正好也在旁边，说：唉，你看看，两位副总理都专门讲了，你们要努力做好工作，做好这些事儿啊！

陶铸后来也接见过我们，当时他是中央改组以后的第四把手，他也肯定了西纠。可以说，这是这批老干部对毛主席发动文革这种无序做法的一种变相抵制。当时在西纠，我们大家一张嘴就是保护老干部。但其实这场运动就是要通过打乱国家机器，最终要打击的就是老干部。

在关心西纠的这些老同志中，要说操心最多的还是周总理。他的命运就是这样，他又要跟着主席走，又想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运动的混乱情况。所以，他要抓住各种可能性来做这些事。今天来看，当时周总理把我们作为一个工具，或者说是可资利用的一个力量是很明确的。我的印象是，确如总理说的那样，当时部队、警力都不能发挥作用了。社会上没有一种有组织、有权威、有能力的体系可以直接处理这些问题，总理甚至把北京站都交给红卫兵来管，就很说明问题了。而我们西纠恰好有这么一个背景，我们就去做了这件事。

其间，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还找我和赵胜利布置保护班禅的事，他说：我受总理委托，给你们一个任务。民族学院的学生要斗班禅，所以派你们去保护好班禅。总理交代，班禅很有价值。如果搞得不好，在被批斗中间很容易致死，一定要留活口。这是总理原话。“留活口”，好人坏人不说，反正是不能动手，更不能打死。民族学院的学生会很激进的，所以你们西纠要去保护好班禅。

那次西纠保护班禅，是我亲自带队去的。我安排了三圈红卫兵手挽手，把班禅围在当中。那时候西纠已经声名远播了，所以没有发生什么对我们的冲击事件。当部署安排的时候，我说：如果有人冲上来就拦住，任何人不准接近。如果接近就驱赶，硬冲的话就用皮带打。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谁要冲就打。只有用这种办法，要不然挡不住。我记得，当时我围着班禅转了一圈，他身体很壮，满脸络腮胡子。底下民族学院的学生在围着批斗。我看他时，他眼睛往上翻着，我的感觉，他当时的心态是很抵触的，很不服气那个劲儿。我一看，当时就倒吸一口气，他这样的态度，真对立起来后果不得了。真要是有人冲上来，那一定是激烈对抗，那样班禅就没命了。但是这些红卫兵纠察队员显得也很凶，谁也不敢上。这种保护方式也太特别了。

程砚秋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去世时留下了一些房产和文物等。文化革命初期，红卫兵的抄家破四旧给他的遗孀果素珍造成极大的压力。为了争取主动，她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除了少量房屋要住用外，程老留下的房产及剧本、戏装、文物和其他财产等统统上交国家。周总理看了这封信后，就把保护程砚秋遗孀的任务，交给了我母亲。她就跟我说，你们西纠派人跟我一起去。当时她也没有警力，也没有部队，就带着我们西纠的人去的。后据赵胜利告诉我，到程家后，程的遗孀一看到我母亲，知道是周总理派来保护她的，顿时热泪盈眶。（12）

◇ 母亲与西纠

我觉得，我母亲在西纠的事情上有双重的身份。

一方面她就在总理身边，她了解总理的想法、总理的意图。所以，她要贯彻他的意图，她不是完全被动的，有主动的一面。我母亲做过周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后来毛主席取消了办公厅，周总理也取消了办公室，我母亲就转到国务院做副秘书长。在当时的妇女干部里面，除了党内几个老大姐们以外，她算是非常出色的女同志，40岁出头就做了副部级干部。总理那儿当时的秘书很多，分管不同的工作。她和范若愚大约前后或同时在总理那工作。范若愚是理论秘书、学习秘书。我母亲负责过农业、文化方面的工作。还有其他同志分别负责外交、军事、工业等方面的工作。

另一方面，她作为母亲对我们兄弟俩有个基本认识，认为儿子们还不错，不胡来，还是有点本事、有点水平的，不论在政策的把握上还是文字上都还可以。这是个大的概念，她对我有所肯定。但是当看到她看到我们和造反派对立的时候，她就直接打电话过来制止了。比如说她坚决阻止我们和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冲突。当时，朱成昭、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揪斗何长工。西纠过去制止，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西纠参加这个行动的，有好多领导人的后代，邓榕、徐帅的儿子徐晓岩等都参加了。那次地院东方红冲击得很厉害，我记得在楼梯上已

经发生肢体冲突了，后来双方就在楼梯上僵持着。

我母亲一开始打电话找不到我，找到了孔栋。她让我弟弟一定要告诉我，务必要撤出来，不要再和他们冲突。后来，我母亲又打电话直接找到我。我在电话里还不服气，对她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你不要问，就是马上撤出来！你们不能这样顶下去，你们必须撤！她掌握的信息量肯定比我大的多，说明在高层矛盾开始明朗化了，一定是这样。我后来要求西纠撤的时候，下面好多人跟我急了，说：孔丹！你怎么能做这个决定？咱们怎么能撤？！我说：别讨价还价，撤！

后来，我们在国防科委与北航红旗对抗的时候又是这样。那两次，都是我母亲亲自来电话，说你们马上撤回去。她来电话的意思是，你们必须撤，你们不能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对抗。其实，她就差说一句，这是总理的命令了。但这句话她是不会说的，我相信有一层关系在里面，他们有一层交代是我所不能知道的。当时，我母亲就在总理身边。她一直在劝告我们，不要和大学造反派发生冲突。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总理的意思。

成立西纠的指导思想，主旨是维持秩序，后来被江青叫做保皇派，还有一个说法叫消防队。我们在火车站维持秩序，保护班禅，保护程砚秋遗孀、刘诗昆，保护何长工，保护赵尔陆，在石油部我们是保余秋里。后来发展到很多人都来找我们，铁人王进喜也来跟我们联络。王进喜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要成立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大庆支队！所以后来我们被造反派批评是保爹保妈派，也被批判为保护既得利益。因为运动确实已经冲向了整个干部阶层，冲向了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亲朋好友了。

西纠后来的命运走向衰落，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与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的两次对抗。这两个事件标志着我们思想的转变，无论是出于一种本能或者说是一种自觉，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运动不是对着一两个党支部，而是要对着整个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运动在部队也开始了，原来说部队不可以搞文化革命，要稳定，但后来卷入文革的速度也很快。

从西纠成立的8月25日到1966年9月底，大约30多天的时间，西纠的真正作为也就是上面讲的这几件事。但是它的形象和影响被无限放大了。其实到9月下旬，我们就听说陈伯达讲话谈到高干子弟不要担任群众组织负责人的消息，（13）我们这几个西纠的负责人就在十一前后离开了北京，前往外地串联。我就再也没有过问西纠的事情。除了中间回过一次北京之外，一直在外地串联。而西纠在完成国庆节的维持秩序任务后，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很快，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开始，西纠就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应该说，西纠从成立起，从来不是一个特别严密的组织，其总部与各个学校红卫兵的关系如一盘散沙，各学校红卫兵往往是自行其是，其中有些学校（如六中）的暴力行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

在外地串联的时候，我一直关注着北京的政治局势，特别关注着我父母的情况。文化革命中，我的转变是很自然的，很快就站到了对立面，从内心深处反感这场运动。我已经预感到要出问题了，地质部的何长工、国防科委的赵尔陆，都是我父亲的好友。他们一个个都成了斗争对象，王震在农垦部也被整得很厉害。9月份我们还很活跃，但我母亲告诉我，一定不要和造反派冲突。大概是在10月份，我们就无所作为了。但是，我感觉得到这场运动的来头和趋势绝不会停留在这个阶段。我感觉到了一种威胁，甚至是一种恐惧。于是，我一直注意着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报纸上刊登的领导同志名单。当时，毛主席一共十一次接见红卫兵，每一次都有一个名单，当时对老干部的报道方式是：“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我就一直盯着看，我父亲这十一次都参加了。每次看到他在上天安门名单上，我心里的感觉很微妙，隐约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可是更多的是觉得心里有底了，噢，这一劫可能过去了。所以说，我没想到风

云突变，更没料到会来得这么猛烈。其实，一切都还方兴未艾呢。

出问题就是几天内的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1966年12月16日那天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出席了。江青在会上点了五个人的名，有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江青说：要抓出西纠的黑后台，抓出来会吓你们一跳，等等。据说，从不吸烟的总理，那天点上了纸烟，脸色铁青。但当时我尚在外地串联，不在北京，没有亲历这次大会。之后的灾难，就直接对着我和我的父母来了。12月21日我从南京回到北京，因为没有带过冬衣服，只裹着两件很薄的单衣。我是夜里回到家的，一进门，发现整个院子都是黑的。我往正屋走，就看到正房门上全都是封条，只留下我们住的几间厢房。

孔栋这时从床上爬起来跟我讲：前几天开了批判会，江青点了爸爸妈妈的名。点完了名，地院东方红的造反派马上就跟中央调查部机关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动手抄家，然后就封了门。我说：毛主席最近接见红卫兵，我还都看到了爸爸的名字呀，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呀。所以，我在外地还放心地转来转去。他说：就是这几天的事情，原来父母都可以自由行动的。江青一点名，爸爸就被隔离审查了，来势汹汹。妈妈呢，也就基本上不能回家了。之后，他跟我讲到另一个事儿，就是现在有人成立联动什么的。我说：再说吧，我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我们还在聊着，门口就来人说：你父亲住院了。我说：啊，住院了？在哪呢？他说：在北大医院。我和孔栋马上就过去了。到门口一问，人家说没有孔原住院啊。我马上问了一句：有个许明没有啊？人家一查，说有。我转身就跟我弟弟说：坏了，出事了！我跟弟弟虽然只差一岁，但当年我对父母的理解可能更多一些。我的相貌和性格也都像我母亲，所以我可能更了解她。我父亲历史上经历过很多波折，有人说他是“老运动员”，承受能力比较强。我母亲不一样，她一直都是党内大家都看好的优秀女干部，而且资历也不浅。可我母亲性格刚烈，和我父亲有所不同。当时我的直觉就告诉我，妈妈自杀了。在向抢救室走的路上，人家就说：你妈妈服安眠药自杀了，正在抢救。

孔栋听人说：哎呀！昨天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她睡不好觉，让我把床头柜的安眠药给她拿点送去。我不认识什么安眠药啊。妈妈说没关系，你把床头柜的药全都给我拿来就行了。所以，那天我就把所有的安眠药都带去了。孔栋告诉我，以往我们去找我母亲，都要进她的办公室。这次去送药的时候，是她自己走出来的，没有让孔栋进去。他们是在北海大桥上见的，就是北海和中南海之间的那个大桥，桥西边是国务院的北门。大冷天里，他们就在北海大桥上来回走，边走边谈，谈了很长时间。我弟弟的情绪也很激昂，说要跟这些大学造反派斗啊，包括对中央文革有意见等。我母亲就劝他：你们要冷静啊，不要再跟中央文革对抗，万万不可以。她还提到西纠去地质部和国防科委的事，以这些事的处理劝说孔栋。孔栋不服气，说：那是他们不对，我们做的没有错。我母亲说：等你哥哥回来，你跟他讲，一定要注意，不要再和造反派对抗！！

后来很长一个时期，我真正后悔的事情就是，我不应该在那么敏感的时期出去串联。我跑出去大串联，当逍遥派了。如果我在，可能还有机会救我母亲。她那时很难跟外面沟通了，我可能还有机会和她交换想法。

我母亲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被隔离审查，但是江青直接点她的名，甚至把与西纠毫无关系的她的丈夫也抓了，后面等着她的将是什么？我想她是看清这个形势了。我们后来得知，这天她回到办公室以后，把办公室的屏风拉到值班床的前面，横着挡住人们的视线，然后把所有的安眠药，包括速可眠什么的，放在一个玻璃杯里用水冲了，喝了有一半左右。喝药之后，她关了灯，人就爬到值班床的下面。这期间有人来找过她，因为那个屏风挡着，所以别人进来，开灯

一看，都说许明不见了。后来感觉情况不对了，找了好久，我母亲的同事才在床下找到她，赶紧把她送到附近的北大医院。

这是1966年12月21日夜里的事。我母亲就在我回到北京的那天夜里，大致就是我到家的那个时间吃了安眠药，凌晨发现之后被送到医院去抢救的。我们到急救室时，她已经没有知觉了。那时候医疗条件不行，没有什么办法，就给她点滴什么的。直到她自杀24小时之后，才弄到一个人工肾，现在叫肾透析机。洗了肾之后，呼吸似乎有了比较明显的好转。实际上，药力在这个时间内已经从她的血液进入了细胞，毒性就大了，这时再做透析已经不行了。我在医院守护时，我父亲也被两个造反派押着到医院来了。他只和我们说了几句话。他还对那两个造反派说了一句：你们报告一下，孔丹回来了。我当时还挺奇怪，他在说谁呢？向谁报告孔丹回来了？

熬了一夜之后，好多同学和朋友听说了都来医院看望照顾，还主动要给她输血。我看母亲情况好像有点儿缓，下午3、4点钟就回家去休息一下。现在看，我母亲当时是回光返照。我回到家坐下喘口气，刚想去洗个澡，这时门口就来人了，说：有人找你。我说：谁呀？就站起来了。一下子进来了6个警察，问：你是孔丹？你被拘留了。这时，我才明白我父亲那句话的意思。他们已经决定要抓我，可能问过我父亲我在什么地方。在我母亲还生死未明的时候，我被抓起来了。我母亲什么时候死亡的呢？就是那天晚上。那一天，我下午进了监狱，我母亲晚上去世了，我父亲也是此后由隔离审查转为监禁，进了监狱。

◇ 西纠祸及父母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运动就已经遏制不住了。红卫兵的发展态势已经超出学校范围，走向了社会，抄家、破四旧、冲击领导机关、搞批斗等，十分混乱。

我们成立西纠是在中央发布了《十六条》之后。我觉得《十六条》在某种意义上，是党内高层一个妥协的产物。它一方面反映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要继续深入地搞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反映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批领袖，出于保护老干部和稳定社会秩序而制定的政策界限。其实在共产党的长时期发展中，无论什么情况下，任何运动，无论是全局性的运动，还是局部性的运动，都是有政策要求的。不管这个政策要求是左了呀，或是右了，但是都有它的条条框框。比如四清有23条，文革先有《五一六通知》，经过实践，又出来《十六条》这样的指导性文件。所以说，《十六条》像以往的政策一样，那里边讲得很明确——“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今天看，当时毛主席出于彻底发动群众的目的，有意识地在放任社会、特别是放任红卫兵们去突破政策界限。整个社会失控，局面十分混乱。当时虽然我们认识不到这么深层的问题，但是凭借着我们多年所受教育而形成的思想意识和本能，就成立了西纠。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有能力按《十六条》的要求，为党中央、为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而推行这个政策。

这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学红卫兵走向社会破四旧，一些批斗也涉及到了北京市教育局、教育部、团中央等机关。而且，大学的红卫兵也起来了，而他们的矛头已经指向了党政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了。总之，红卫兵运动已经不像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仅仅停留在校园里和对当时的大学党委、中学党支部的批判了。其斗争和冲击对象，已经不是当时传统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了，矛头直指党政部门以及领导干部。这是对我们思想的极大冲击。我们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广大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是好的，他们的缺点错误可以批评批判，但不应都被打到。因此，我们希望尽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广大的老干部。但恰恰是这一初衷，实质是对文化革命的反动，也成为西纠很快陷入灭顶之灾的根源。

西纠看起来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就我们而言，我们自认为是按中央精神做的。彭小蒙、卜大华他们发起红卫兵的自发行为，让毛主席大笔一挥就推动了群众运动；我们成立西纠的自发行为，被党内实际上以周总理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抓住，试图起到制衡和控制局面的作用。从本质上讲，西纠这件事反映了文革初期党内一些老干部，希望借重一种群众组织，也就是一部分红卫兵来抵制文革路线的一个思路。比如我母亲当时了解到叶帅支持西纠、愿意给西纠提供物质帮助时，她马上想到把这个事儿接过去，也反映了她是想用国务院的系统来制止混乱、控制局面这么一种思想。

总理亲自召集我们开会布置任务；总理身边的人直接向她的儿子提供物质支持；总理让国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给我们交代各项任务。这样一种事实，能说不是总理在后面支持西纠吗？所以，不能说中央文革因为抓西纠的后台而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是空穴来风。人家就是把西纠当作周总理的一个罪状来处理的。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周总理的支持，也不可能有这些安排。我相信我的母亲和李梦夫这些人没有这样的权力，肯定向总理报告过。

我母亲自杀前曾留下了一个遗书。遗书当年没有给我们看，直到今天我也始终没看到。但是据当时看过的人传出来的，有这样一句话：“关于西纠的问题都是我的责任，与周总理无涉。”我母亲实际上是想通过自杀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是我受屈辱；一个是西纠的事我来负责，切断与其他人、特别是与总理的联系。还有一句话：“我的儿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应该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她去世的时候才47岁，现在连母亲的遗书都找不到了。我母亲这么决绝地主动选择了死亡，我想她是想切断和总理的联系。死无对证嘛。另外我觉得她性格上强硬，不堪受辱。文革后重开追悼会时，我在她的悼词里加了个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然是隐喻，但也说得很白了。

我想，母亲当时因为西纠，压力很大，但其实她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我母亲在文革初期就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那幅对联，说这个应该改。我母亲那时在国务院联络站，负责与群众的联络。当时陈伯达给她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许明同志，这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建议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请你在国务院联络站公布。我母亲就把这个作为一个正确的意见，实实在在地在国务院的接待站公布了。谁知，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

当时的红卫兵们大多很激进，对此意见很大。这个意见发布以后，就被群众围攻。这些以红卫兵为主的群众说：陈伯达你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怎么能说这个话？你怎么能反对这个对联呢？！后来，陈伯达说，这是许明在国务院联络站有意挑动学生和陈伯达的关系，挑动学生把矛头对准他。这也算是她一条罪状。这还没完，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就把这个情况写了一个报告给毛主席，内容是说许明在国务院接待站发布这个，实际上是挑动群众对着伯达同志。毛主席看后就批了：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对一个高级干部来说，毛主席这话份量是很重的了，也许是我母亲参加革命以来受到的最严厉的批评。

另外一方面，听说我母亲和江青关系一直不融洽。她们在延安时期就是党校的同班同学。她们之间谈不上什么宿怨，主要因为我母亲这个人非常清高，并不怎么尊重江青，没有把她当成什么主席夫人。大家凭本事工作，主席夫人又怎么了，有什么了不起？她大约是那样一种心态。后来我母亲在总理那里主管过文化方面的事，像样板戏《沙家浜》，开始叫《芦荡火种》，这些京剧改革的事情母亲都参与了。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和性格上的问题，她就和江青有了一点摩擦，也有过这样那样的冲突。江青是一个心理很阴暗、很变态的人，非常狭隘，凡是原来对她有点不恭的，她都会记恨。我相信这很符合她的性格。

更重要的是，主席表态了，西纠又成为了文革运动的阻力。中央文革的搞法，就是找事儿。

正好你许明赶上西纠的问题，又是总理身边的人，那正合适去整你。吊诡的是，我父亲孔原当时是中央调查部的部长，本来和西纠的事情根本就没沾边呀，也被江青点名一把撻进去了。我想，主要原因就因为他是许明的丈夫，马上就被隔离审查了。后来又以监护审查的名义，投入监狱里关押了7年。江青在大会上说，要抓出西纠的黑后台，抓出来要枪毙。那压力从天而降，骤然加剧。所以我母亲自杀，它是有一个背景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西纠事件。这些高层的事情，我们当时还不知道。

因为西纠，我个人付出的代价、我们家庭付出的代价，以及我母亲的自杀，都和西纠的事情密切相关。那时他们的做法很厉害，谢富治原来还支持过西纠呢，说西纠救过他一命。可我后来听谢富治的儿子谢国庆传出来的话，谢富治曾恶狠狠地说要杀一儆百，要处置几个人。

今天回想起来，当年西纠的事儿如果是由叶帅直接支持，我母亲不要接过来，大概可以释放一点儿压力。我母亲不介入这么深，我父亲也不会被卷进去。一定意义上说，我成了惹事的根苗了。要没有这事儿，我觉得我母亲陷不到这个程度，也不至于自杀。我父亲在文革中垮台还是要垮的，这是跑不掉的，但是不会那么快就被一巴掌打下来。1966年12月16日的大会之后，我父亲被隔离审查，21日我母亲自杀，23日我被抓进监狱，当天晚上我母亲就去世了。很短暂的时间，前后就是几天的工夫，我们就家破人亡了。

今天历史地看这问题，我觉得当年甚至什么要当学生领袖、当红卫兵头儿的想法都没有，就是多年教育出来的那套规范的东西，所谓党的传统观念，就把我给架在那儿了。如果没有那么一场，我不会有牢狱之灾不说，我母亲也不会顶在风口浪尖上，家庭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悲剧。西纠，可算是我一生的梦魇，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大半生；当然，由此造成的突如其来的家破人亡，也成为我一家人不幸的渊薮。

1975年，举行了我母亲在八宝山公墓的骨灰安放仪式，低调地恢复了她共产党员的名誉，算是第一次平反吧。打倒“四人帮”后，1978年举行了正式的追悼会，李先念、王震、余秋里等很多老同志都参加了。这第二次才真正彻底地为她平反昭雪，也为她一生划了句号。

注释：

〔11〕详见陈小鲁口述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二。编撰者注。

〔12〕据赵胜利回忆：许明同志得到总理批示后，在国务院开了会，请了西纠、大学一、二、三司以及戏剧学院、银行、房管局等单位的代表参加。孔丹派我和姚宁作为西纠的代表参加。会议一开始，许明副秘书长宣读了程砚秋遗孀给总理的信，请戏剧学院的代表介绍了程老在艺术上的成就与地位，请银行及房管局的代表讲解了有关政策，并根据相关政策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最后许明同志对我们这些红卫兵代表说：今天请你们来，是和你们一起研究一下怎样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我们一起把这件事处理好。我们这几部分红卫兵代表们一致表示，坚决按党的一贯政策办事，同意戏剧学院、银行及房管局提出的处理意见。会议结束后，我们全体与会人员前往期砚秋家。见到程夫人后，许明同志拉着她的手对她说：总理收到了你的信，派我来看望你。只见程夫人顿时热泪盈眶，连声说：谢谢总理！落座后，许明同志以商量的口气把具体处理意见告诉了程夫人，程夫人十分满意。之后，许明同志当即要人起草了一份布告贴在大门外，大意是程砚秋家已经红卫兵等革命群众组织检查过，不允许再查抄，落款是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以及大学红卫兵的三个司令部。编撰者注。

〔13〕1966年9月25日，陈伯达在接见外地红卫兵时提出，高级干部子女把持领导权对运动不利，对本人不利。他以个人名义建议：高级干部子女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当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子弟领导文化革命。编撰者注。

(未完待续)

~~~~~

## 【百家争鸣】

### 阿伦特与中国极权主义问题

• 陶东风 •

“新时期”伊始，包括我在内的启蒙知识界比较普遍地用“前现代”“封建专制”等术语和范畴解释“文革”，即把“文革”理解为一种前现代的封建专制现象，它直接接续了中国“五四”前的封建主义。因此，反思“文革”、告别“文革”就要继续“五四”启蒙主义。这样的解释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很难说无懈可击（毛泽东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但是封建专制说只解释了“秦始皇”而没有解释“马克思”）。比如，“文革”的意识形态是打着“反封建”旗号的现代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这种理论，它毫无疑问带有现代性。再比如，“文革”时期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组织、整合和渗透程度、一体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古代任何一个王朝，也是任何一个前现代社会不可能发生的现象。而“文革”式的全民参与的社会动员和社会运动在所谓的“封建时代”也是不可思议的。

90年代后，随着现代性理论的引入和时兴，出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文革”的解释：“文革”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实践。它不但是现代的，而是超级现代的，是比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更为现代的（因此也是更为“先进”的），是在寻找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这种解释虽然时髦新鲜，且常有惊人之论（比如“文革”是比西方代议制民主更高级的直接民主形式，“鞍钢宪法”等于“后福特主义”等等）。遗憾的是，它无视“文革”造成的几千万生灵涂炭的基本事实，其惊人高论无法得到起码的经验支持。

于是我开始不断思考一个跟我本人密切相关的大问题：“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文革”到底是前现代现象还是现代现象？说它是现代现象就必得把它说得天花乱坠吗？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同时接触到的还有：鲍曼的现代性理论，特别是他那本用现代性理论解释纳粹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哈耶克和波普尔的自由主义理论，他们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归入“极权主义”；以及哈维尔等东欧思想家对极权主义与后极权主义的批判。）同时我也发现有一些中国学者尝试用极权主义解释“文革”。这种解释模式同样把“文革”归入现代性的实践，但却是一种反人类的、与人为敌的现代性实践。

那么，“文革”是极权主义吗？极权主义这个词对反思中国现代性有什么意义？如果说中国“文革”是极权主义，它和纳粹式极权主义、斯大林式极权主义又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一种中国自己的极权主义？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写在“文革”前（1951年初版，1958年再版，但未作重大修改），其经验原型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对于“文革”前的中国是不是极权主义，阿伦特在1966年6月给《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写的“序言”中说得含糊不清，犹豫不定。关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阿伦特这样描述道：“当反对派消失之后，在中国的恐怖没有增加，不再屠杀无辜，没有‘客观的敌人’，没有公开审判。”当局主要是通过“洗脑”“思想整顿”等来统治人民。她认为这也是“恐怖”，一种“不同类型的恐怖”。与此同时，她还指出，共产党胜利后立刻进行“组织上的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它的极权主义迹象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出来。”（第25页）。这些文字似乎表明阿伦特把当时的中国也纳入了极权主义；但另一方面她又指出：“毛泽东思想明显地并不遵从斯大林（或希

特勒)的路线,他的民族主义情感明显地和一切从前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造反起义一样,其强烈的程度足以使全面统治(total domination)受到限制。这一切似乎不符合本书写到的某些恐怖。”(第24页)这又表明阿伦特并不肯定中国是不是极权主义,至少不是典型的极权主义。这种犹豫不定的态度一方面是由于阿伦特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资料的缺乏(她自己明确承认这点),另一方面是她认为当时中国只有极权主义的一些“迹象”,而其发展趋势还不明朗,所以很难下结论。总起来看,阿伦特认为中国有极权主义的迹象和特征,但是它和希特勒和苏联的极权主义肯定不同。

尽管学术界对于“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争议颇多,我自己对当代中国社会属性的界定也一直犹豫不决。而且由于阿伦特思考极权主义时中国“文革”还没有发生,因此,她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特别是是否属于极权主义)的分析的合理性应该受到相当限制。但无论如何,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思考对理解包括“文革”在内的当代中国仍然颇具启发意义,它特别有助于我们走出这样一种思维模式:要么认为当代中国是传统封建专制主义的翻版,缺乏现代性(似乎任何专制社会都不可能是现代社会);要么认为当代中国不但是现代的,而且是比西方更高级的现代。阿伦特明确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现象,是在现代社会出现的、不同于历史上所有专制独裁形式的一种统治类型,而且其反人性的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独裁统治。她反复强调极权主义的“新颖性”,极权主义与所有传统的决裂。

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一些具体观点对我们理解“文革”绝对是极富启发性的。

比如,她认为极权统治的基本特征是意识形态与恐怖,它的看起来逻辑严密、首尾一贯、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对于经验现实具有“免疫能力”:免于共识和现实的制约。经验现实必须服从意识形态(“自然法则”“历史法则”等等)而不是相反。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无疑是这种意识形态狂热的集中体现:虽然大跃进的口号、目标明显违背了几乎所有人的常识和经验,但是以然因其“政治正确性”而被狂热执行。最近看到王学泰先生在《监狱琐记》中的一段文字,讲到他一生的三次“大事故”:

第一次是1958年10月。我读高中,下乡劳动,深翻土地,种小麦高产田,来年要亩产120万斤。当时我说,一麻袋能装200市斤小麦,120万斤可装6000袋。一袋平放在地上占地6平方尺,一亩地可以平放1000袋小麦,6000袋要码6层,相当于一房多高。我问什么样的麦秆可以把这6000袋小麦挺起来呢?那时是组织军事化,这话是我在连队生活会上提出的疑问。连队汇报到团指挥部,带队劳动的是一位留校学生,刚被提拔为教导主任,颇带点少共意味,有决断,多激情。他听了之后必然大怒,认为这不是与党唱对台戏吗?竟敢怀疑“大跃进”,不相信党报上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政治错误,必须严厉批判,肃清流毒。

可见意识形态与经验、现实以及常识的脱节到了何种程度,而且还能继续运行。

比如,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具有非人化特征,把自己要打击的犹太人和“阶级敌人”贬低为应该加以清除的“臭虫”“劣等民族”,消灭这些人不但不是犯罪,相反是遵循“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的正义行为,推动了“历史的前进”。用这个理论解释“文革”中的大屠杀现象(比如著名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北京的大兴大屠杀),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说服力,这类大屠杀都是以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为依据,把“五类分子”“敌人”非人化为可以清除、也应该清除的“牛鬼蛇神”,为杀人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理论上的合法性:杀掉他们是清除人类的“害虫”而不是杀人。“黑五类”类似法西斯说的“劣等民族”,所谓“成分”本来就是一种“血统论”。在中国历史上好像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大屠杀行为。

比如，阿伦特指出，合法政府是受到法律限制的，依据成文法行事，而专制意味着这些边界的被突破，传统专制统治的标志是它的非法性，无法无天，以便专制者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家。但极权主义却并不是上述意义上的非法政府：极权主义一方面不尊重成文法，它发动的运动根本不受成文法的制约；但同时又认为自己遵从的是高于成文法的“自然法则”（希特勒）或“历史法则”（斯大林），而不是胡作非为，它的非法行为于是具有了超越成文法意义上的更高的合法性，它的法不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成文法，而是所谓的自然或历史“法则。”这点也可以用来解释“文革”时期的打砸抢烧无所不为的“造反”运动：虽然在成文法意义上的违法的，但是当事人却自以为是在遵从历史发展的最高法则。

再比如，她分析了极权主义的悖论：它的那种“新颖性”恰恰代表了对个体的行动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剥夺。“文革”时期也是如此，“文革”式的运动好像极大地激发了人的创新能力，但是同时又摧毁了人的个体性的复数性，那些以创造新社会新人类自诩的人们实际上没有任何个体性和自主性，不过是齿轮和螺丝钉。

当然，这不是说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就能完美解释中国的“文革”。正如卡诺万指出的，“极权主义的概念非常歧义，有多少理论家谈论这个话题，就有多少不同的含义。”这正是需要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原因。德国的国情、苏联的国情都和中国差别很大。纳粹是极“右”极权主义，苏联是极左极权主义，中国虽然和苏联更加接近，但是也同样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持续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秘密警察现象和暗杀现象也不如苏联突出。

但无论如何，用极权主义解释“文革”，至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注释：

- 1、有趣的是，阿伦特很肯定地认为二战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极权主义，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再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二战和法西斯主义的灭亡没有使得苏联极权主义结束，相反，它扩展到了东欧。”《极权主义的起源》，第22页。
- 2、《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8年，第24页。
- 3、请特别参见《极权主义的起源》第十三章。
- 4、王学泰《监狱琐记》，三联书店，2013年，第2页
- 5、Margaret Canovan: Arendt's theory of totalitarianism: A reassessment,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Ed. By Dana Vill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5。

□ 原载《共识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